

DANGDAI ZHONGGUO
JHAOYU SHILUN

当代中国 教育史论

■ 宋恩荣 吕 达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Editorial Policies

A horizontal color bar consisting of a series of small, square pixels. The colors transition from a dark, almost black, pixel on the far left through various shades of purple, blue, green, and yellow towards the righ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0 distinct color steps in total.

当代中国教育史论

DANGDAI ZHONGGUO JIAOYU SHILUN

宋恩荣 吕达 主编

刘立德 高恒利 副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教育史论/宋恩荣、吕达主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ISBN 7-107-17584-X

I. 当…

II. ①宋…②吕…

III. ①教育改革—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教育—
发展—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G5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283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100009)

网址：<http://www.pep.com.cn>

益利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2.5 字数：538 千字

定价：44.90 元



目 录

|| 第一编

- 关于学习、贯彻“三个面向”的回忆 /2
高举“三个面向” 坚持继往开来 改革课程教材
——纪念邓小平同志为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题名二十周年 /6
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教育思想 /44
论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 /65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70

|| 第二编

- 关于当代教育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学术、学理的视角评价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80
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地方教育史研究散论 /88
已成为历史的 20 世纪
——关于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的几个基本问题 /94
新教育方针的确立步履维艰
——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向“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转变的曲折过程 /117
简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44
怎样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真正内涵 /15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155
共和国教育制度的崛起
——试论新中国教育制度建设的成就 /167
现代中国教育价值的迷思 /176
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关系 /187



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结构

——从教育现象看中国社会的特征 /197

|| 第三编

浅议怎样学习和吸收中外教育思想	/21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教育交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222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经验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232
新中国“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征	/242
解读教育“大跃进”及其背景	/255
坚持速度、质量与效益的统一 ——教育“大跃进”的反思兼论教育发展的辩证法	/270

|| 第四编

对素质教育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284
“应试教育”的终结与素质教育的勃兴	/291
学校道德教育的反思与走向	/303
更新教育观念是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先导 ——兼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避免的几种倾向	/311
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320
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师专业发展	/328
当代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历史性矛盾及其时代性思考	/332

|| 第五编

以研究为基础促进教材建设 ——谈高等学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主要课程教材的编写	/342
当代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之研究	/348
教师专业化与高师教育专业课程	/356
探索教育系科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370

|| 第六编

论新时期私立教育发展的政策创新	/382
政府与民办大学：中国、越南比较的视点	/395



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工作的十点建议	/407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414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乡村教育边缘化问题研究	/421
中国全民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分析	/437
日本学者对中国教育的研究	/459
庄子思想与当代教育	/473
作为实践伦理的“孝”、“敬”教育——家庭、学校、社会	/482
试论日本的人权教育计划	/492
附录一 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委员会规程	/500
附录二 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十年大事记	/503
附录三 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名单	/504
附录四 本书作者简介	/506
跋	/508

目
录





DANGDAI ZHONGGUO JIAOYU SHILUN

第一编



关于学习、贯彻“三个面向”的回忆

— 学习、贯彻“三个面向”经验交流会 —

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的题词，不是对一个学校提出的一般要求，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方针。

当时许多地区、许多学校对“三个面向”的重大战略指导意义认识不足，但在上海，“三个面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吕型伟认为，“三个面向”的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认为现在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出现了知识爆炸的新情况，原来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班组教学模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他提出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要开辟第二课堂，并亲自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搞了试点。对他提出的这些新观点，上海教育界是有争论的，教育局的内部也有争论。1984年2月，我到上海考察、了解“三个面向”大讨论的情况，到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了解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我到学校听课，实地考察第一课堂教学改革的成效，也了解了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情况。该校提出少、精、活的教学原则，向四十分钟要质量，改变课堂教学中只是先生讲、学生听的模式，启发学生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对学生发表的各种意见由教师综合做出正确答案。该校将课堂教学完全安排在上午，下午开辟第二课堂活动；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建立了各种兴趣小组，发展学生的智能。我对该校的教改试验很感兴趣。在听取校长汇报时，我充分肯定了该校教学改革的路子和经验，但指出该校提出的“破除课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的提法需要慎重研究。这也是上海在开展“三个面向”大讨论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在听取市教育局关于“三个面向”大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我充分肯定了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比如“破除三中心”的提法问题，指出：从静安第一中心小学的改革实践情况看，“三中心”是不能破除的。当前虽然出现“知识爆炸”的情况，但一些基本的东西还必须学，而且必须学





好，还要解决一个吸收新知识和采用好教材、好课本的问题。课堂教学要改革，但搞好第一课堂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课堂教不好、学不好，第二课堂也难以搞好。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伸。过去讲尊师重教，只强调学校以教师为中心，不重视学生在学校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些方面应该改革。但越是要改革越是要提高教师的水平。改革第一课堂教学要求教师搞好备课，讲求教学方法的改革；开辟第二课堂要求教师进行精心组织与指导。这些方面都需要提高教师水平，更好地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在教学改革中，要正确处理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的关系，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正确处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关系。经过与上海市教育局负责同志共同研究探索，我们对以上问题取得了共识。后来我将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和上海市教育局的两次谈话，整理成一篇题为《倡导“少精活”原则，进行教学改革》的文章。

在深入考察研究上海“三个面向”大讨论和进行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7月28日，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学习研究“三个面向”问题。王震、胡启立、严济慈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与会同志，并与大家合影。王震在会上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肯定。这次学术讨论会集中与会者的意见，对以下重要问题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与论断。

会议认为，“三个面向”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1977年以来，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有系列的重大论述，深刻阐明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对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有新的精辟的阐述和发展。“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和高度概括。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基础是“面向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向现代化”就必须“面向世界”。我们必须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成果，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教育工作周期长，本身就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必须未雨绸缪，从现在起为90年代的经济振兴和21世纪前期的更大发展作好人才的准备。“三个面向”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要培养的一代新人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必须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够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

挑战；必须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搞好我们的现代化，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贯彻“三个面向”，要同实现党的总路线、总目标联系起来，正确解决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建议的关系，正确解决继承发扬我国教育的优秀传统和学习借鉴外国有关经验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贯彻“三个面向”，进行教育改革，要正确处理好几个根本的问题：

- ①正确处理学习基础知识与发展智力、特别是发展创造力的关系。
- ②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不只要研究如何教好，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学好。
- ③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
- ④正确处理集体教学与个别指导、因材施教的关系。
- ⑤正确处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关系。

这次关于“三个面向”的讨论会，对我国教育战线深刻领会“三个面向”的精神，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上海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主持工作时，特别注意了上海教育改革的经验。当时，全国各地集中力量抓重点中学建设。在抓重点带一般的过程中，某些非重点中学出现了一些认识问题，认为自己的条件与重点中学比不了，重点中学的经验也学不了。后进的中学更是抱着一种自卑的心态。上海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针。吕型伟同志认为，重点中学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各方面的支持，理所当然应当办好，而办好一所后进的学校其意义不亚于办好一所重点学校，变后进为先进的经验更有推广的价值。上海在抓后进变先进的实践中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这引起了我的重视。

上海市闸北八中“转化差生变先进”的经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上海闸北八中在几个水平较高的学校中间，招收的学生是被其他学校选拔后没能入学的差生，甚至有双差生，这给了闸北八中很大的压力。如何转化差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该校在转化差生中创造了“成功教育”的经验，其办法是从每个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注意每个学生的特点与特长，从其特点和特长出发，引导帮助学生进行发挥和发展。只要学生取得一点儿进步就加以鼓励，使他获得成功的喜悦，增强成功的信心。结果转化差生的工作不但



取得了成功，还培养出了很多有用的人才。闸北八中从此由后进学校变成先进学校。我认为闸北八中的经验很有意义，在闸北八中召开了经验交流会。该校转化差生、变后进为先进的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武汉粮道街中学在学习闸北八中“成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希望教育”的经验。

上海创造的“社区教育”经验也很值得注意。1991年10月23日，我带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同志到上海调查《上海教育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对上海“先一步、高一层发展教育的经验”加以肯定。在考察中发现了上海创造的进行“社区教育”的经验。该市南市区小东门街道，人口密集，商贩等流动人口多，犯罪率高。他们抓了“社区教育”，以学校作为依托，搞好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改变了社会风气，使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犯罪率大大下降，成为一个模范街道，把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了实处。这个经验是很有意义的，打破了学校教育和社会隔离的状况，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育人，优化了育人的环境，为学校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建立了基地、提供了条件。上海“社区教育”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湖北沙市、成都青羊区抓“社区教育”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上海在坚持“三个面向”的战略指导方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教育学会1993年10月在上海召开第七次学术讨论会，纪念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出席讨论会并讲话。与会同志通过讨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化了对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的认识。我国教育改革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适应时代的要求，进入了更加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会前，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写信，邀请他出席会议。李岚清同志批示：“承先同志：我本很想出席此会，听取各位的发言，但不巧我此时有任务不在北京，不能出席了。我支持这次会的召开，并请代向各位与会同志问候。”会后，我给李岚清同志写信汇报讨论会情况。李岚清同志在信上批示：“承先同志：此件我仔细读了，有许多意见很好，可以围绕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写些文章，在教育报刊上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张承先)

高举“三个面向” 坚持继往开来 改革课程教材

——纪念邓小平同志为教育部课程教材
研究所成立题名二十周年

热烈庆祝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

- “三个面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 邓小平旗帜指引我国中小学教材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
- 应运而生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二十年来业绩辉煌
- 党和国家一贯关心中小学教材建设
- 中小学教材改革发展的经验和问题
- 从“三个面向”到“三个代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改革发展，开拓创新



一、“三个面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十年前——1983年7月，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同志欣然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随后不久，9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著名的“三个面向”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重要的战略思想。“三个面向”的真谛是面向现代化，也就是说，教育必须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面向现代化，就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是为了面向现代化。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从空间上看，或者说从横向上看，必须面向世界，放眼世界，既要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又要努力寻求教育的共同规律，把目标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经验，进而使中国走向世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如果闭关自守，夜郎自



大，那只能是越来越落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从时间上看，或者说从纵向上看，必须面向未来，着眼未来，把目标定位在培养跨世纪人才上。今天的教育，必须着眼于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社会。

教育现代化，决不仅仅是办学条件设备等“硬件”的现代化，而更重要的是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技术、艺术、手段、方法，教育管理、评价等“软件”的现代化。

“三个面向”是一面理想的旗帜，是一面鼓舞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旗帜。如不高举这面旗帜，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动就没有远大的目标，理想就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我们就有可能永远落后，甚至挨打。

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针。应当指出，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领先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当时《课程·教材·教法》是双月刊，发稿见刊周期至少在两个月以上，由此可见，1984年第1期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见刊的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是相当及时的。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在“三个面向”题词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课程教材研究十五年》和童大林主编的纪念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发表十五周年文集，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毫无疑问，要面向世界，就必须立足本国，既要大力提倡借鉴，洋为中用，又要加强分析、鉴别，反对生搬硬套。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立足现实，同时正视历史，恰如其分地继承传统，进而开拓创新，以免盲目走弯路，或重复走老路。我国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之一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是最大的国情。同样，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基础和条件也很不相同，发展也极不平衡。就学校而言，既有一批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校，又有一批薄弱学校，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投入和师资问题，以实现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甚至还有不少极为贫困极为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渴望社会伸出援助之手的希望小学。

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应有全面的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既不应“以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实”，也不应任意地或片面地解释素质教育。

“全体学生”是由每个学生组成的，每个学生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基础、程度、水平都有不同的差异。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齐步走，既不可能、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高起点，也不可能、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低起点。每个学生只要能充分开发自己的潜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就是成功。中小学课程教材，既要为全体学生打好共同的必备的基础，使他们达到统一的基本要求，又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为他们今后能胜任不同的学术专业和技术行业，打好分流的基础，作好必要的准备。

“全面发展”并不意味平均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应是统一的。培养通才是正确的，但对于通才，要有辩证的认识和理解。其一，人无完人，才无全才。通才不等于全才。其二，所谓通才，所谓文理兼通，在程度和水平上有不同的层次之分。其三，通才的最主要特点是既要博学多才，更要善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要学会学习，学会求知。中小学不可能教一切知识，也不可能学习一切知识。具备求知的能力，掌握求知的方法，比掌握现成的知识更重要。我们必须要求每一个中小学生在各方面都达到合格的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而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得到更突出的发展，达到更优异的水平。门门全优、门门精通当然好，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学生才能达到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与其追求门门全优、门门精通而又达不到，以致浪费了有限的时间精力，丧失信心，不如门门合格，几门优异。

“主动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使他们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能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从而能生动活泼地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其一，要正确对待教师的作用。强调学生要主动发展，学会学习，非但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减轻责任，甚至放弃责任、放任自流，相反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笔者以为这里首先是要教，要导，要教导得法。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教师的教导、指导、引导、诱导作用。其二，要正确对待



课业负担问题。过重的课业负担固不可取，但是必要的负担和压力，反而会成为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的动力。只有跳一跳摘到的果实，才是既饱含艰辛又充满愉悦的，才会倍加珍惜、终生难忘、回味无穷。

素质教育的内涵应包含全体性、全面性、主动性和差异性（即个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个性，就没有创新。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创新人才，离不开中小学摇篮的培养，离不开教师和教材的哺育。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将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一流的教材，就没有一流的人才。

二、邓小平旗帜指引我国中小学教材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

正因为教材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并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改革开放后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转折。

（一）邓小平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中小学教材步入正规化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与此同时，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中国教育报》登载，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十年动乱后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他还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教育部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大批干部，连同原有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





力量，以适应编写教材的长期需要，1978年2月5日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教育部长（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民教育出版社调集北京的两百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还抽空看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套（也即新中国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1978年秋季就开始供应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容低估的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